



白壽彝史學論集 (下)

白 壽 彝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下)

白寿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五 史学史论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1964. 2. 29)

规律和成果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在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断地高涨，中国史学领域里表现为空前尖锐的斗争。在这里，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象一根红线一样鲜明地贯串着整个史学的发展。这就是五四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举例来说，司马迁决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史记·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里，以财富占有的情况和社会地位的高下去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说明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的不同，这就可以说他在这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上有了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它和当时正宗思想的唯心主义之间不能没有斗争，甚至在它与司马迁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之间也不能没有斗争。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举例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时期。《左传》在全书范围内展开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的记述，视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传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论点；同情齐国的权门陈氏，记述齐国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同情鲁国的权门季氏，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见《左传》昭公三年和三十二年）。《左传》是凑巧了，它在这里同时表现了一种历史观点和一种进步的政治观点。把这两种观点跟五四以后的辩证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它们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史学的这两个基本规律，这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中国史学发展的这些基本规律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的体现。它们相互间既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它们跟社会关系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关系的反映，但反映的形式是复杂的，有时是很曲折的，并且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对社会史起着反作用。因此，对这些规律不能进行孤立的研究，必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结合着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关系来进行研究，才能逐步得到可以信赖的科学论证。

史学史上还有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就其究极来说，技术方面的发展也是为基本规律所支配的。但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有

自己的发展规律。第一是史料学发展的规律，第二是历史编写形式发展的规律，第三是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各有其技术性的细节，也各有其理论上的指导及其分歧和斗争。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着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举例来说：《后汉书》作者范曄批评当时的文章，“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他主张：“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见《宋书》本传）这在历史文学上就有重视历史理解和追逐词藻的根本分歧。陈寿著《三国志》，以曹魏帝纪提挈三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同时又分立魏蜀吴三个不同的部分以记述当时鼎立的历史情况。后来的史家有不少人对此大肆攻击。这当然有一个政治态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编写形式的问题。按历史内容来决定编写的形式和抱住一套死板形式，这在史学上也是有斗争的。在史料学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已是各有千秋，但究竟还是为考史服务，这跟烦琐的考据就有所不同。我国的史料学、历史编写形式和历史文学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规律性的研究上还基本上是空白点。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发展规律的总理解上是很必要的。

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就我们目前的现实需要去考察，去分析史学成果中的精华和糟粕。这并不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而是以今天的标准要我们把工作作到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只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世界。我们对待史学成果，只从历史条件上对它们批判，还只是停留在说明的阶段。现在我们更要进一步从当前革命的需要上去分析它们的作用，是为了在史

学的继承中便于改造它们，使它们有助于我国史学的发展。

按照这样的要求，有些史学成果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精华的，现在就不一定精华了。因为时代的不同和阶级利益的不同，有些过去的精华已经在今天失去它的意义了。有些过去的进步的东西在今天说来，甚至是反动的了。就是这样，我们既从历史上分析了史学成果，又从目前需要上分析了它们，这可以更全面辩证地给它们以正确的评价，也就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史学领域内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并用以作为我们研究工作中的镜子。

除了丢掉糟粕以外，我们并不因为按照这样的要求而丢掉任何东西。我国史学史上的某些真知灼见、优良的治学经验和杰出的篇章，将因历经不同时代的考验而洗炼出它们明晰的光辉，以便于我们吸取和发扬。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虽然现在不行了，也仍然受到在历史地位上应有的尊重。并且对于要丢掉的糟粕，一方面决然要肃清它们的毒素，不许借尸还魂，另一方面也还要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变无用为有用。

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里，指出了对待文化传统应有的两点注意：“一、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需要。”这两点，无论是对阐明史学发展规律或对总结史学成果，都是必须贯彻的指导原则。过去，我们对于第一点作得虽很不够，但总是努力去作的。对于第二点，不只是作得不够，而且是根本注意得不够，这种情况是很值得警惕并必须改变的。

理论和资料

要正确地承担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需要占有丰富的资料，又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还需要二者的密切结合。这对于

我们都是严重的考验，但经过努力，是可以不断前进的。

我国历史记载，从殷商到现在，积累了三千多年之久。一般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数量之多，也并不算夸张。旧日的学者，有的人就因此而掉在海里，把书目和内容介绍当作史学史看待。还有人是站在海边上，一点也摸不到主流，只是把海面上的波涛起伏当作中国史学发展的本身。自梁启超以下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议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时候，特别表现出这样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从根本上跟他们不同，而是“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列宁：《卡尔·马克思》）的。如上文所说到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同样要从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的史学发展中发现规律的统一过程。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可依的蓝本。要在研究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精神，就首先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老老实地学习。学习经典作家对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这是我们作好研究工作不能一刻儿离开的基本功，要活到老，学到老，练到老。

周扬同志在报告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也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参加基层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研究工农群众的斗争经验，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他并说：“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轻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关门从书本上研究，要想对革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这些话特别值得史学史工作者警惕。我们知道，理论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来，毕竟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史学史研究的特点固然需要有大量时间从书本上研究，但如把整个时间封锁在书本中，不结合工农群众，不接触和了解实际，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这就跟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无共同之处；即使熟读经典著作，也是不可能在工作上起显著作用的。把经典著作的学习跟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时刻提

防自己不要成为井底之蛙，这是非常重要的。

占有历史资料，就其本质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分析资料、掌握资料。我们说详细占有资料，就是要对具体的资料作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掌握。一般地抄资料、写卡片，只是帮助记忆、提供检查便利的方法，还说到就是占有资料。占有资料，无论多少，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作好了的。随着资料掌握得日益丰富，同一资料的分析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随着各项资料的分析日益深刻，资料的掌握也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按照这样的反复过程的发展，就越来越有可能发现中国史学矛盾运动中的内在联系，从而逐渐认识其局部的具体规律以至总的基本规律。我们经常谈论的理论和历史资料的结合，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第一，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我国史籍繁富，如果漫无边际地去阅读，费时多而成效小，很容易掉在书海里，不能自拔，先从研究代表作入手，逐个地击破，其余的史学著作的研究就可以势如破竹，比较省力。尽管公认的代表作不是一部一部地都名副其实，但其中总有一部分是名实相符的，或可以说大部分是名实相符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只要我们逐渐占领了一些堡垒，就可以取得经验、提高认识，不断向堡垒的四周发展，不断取得工作上的进展了。第二，所谓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这些代表作。真是要下“攻读”的功夫，要下“熟读深思”的功夫。前人虽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史籍，但并没有留下多少有关史学著作的分析。我们的工作差不多是完全从头开始的，不下硬功夫是不行的。这样的作法好象是很笨很慢，但这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是保证有成效的办法，是必须坚持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需要研究有关的外国资料。首

先，是要注意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提高我们研究工作的水平。其次，我国近百余年的史学受到外国不少的影响，不探本溯源，不易进行深入的分析。再次，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不研究外国史学，就没有一个综合比较的研究，也就不能认识各国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我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中包含帝国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动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捏造。当然，研究有关的外国的资料会增加我们工作上的艰巨性。但为了提高我们研究成果的水平，这是必须作的一个部分。路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一开始，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只要坚持地走下去，一条平坦的道路就终于会走出来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正在展开。本文的意见都是不够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跟同志们商榷。

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

(1984. 9)

中国史学有长期历史。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述也有长期历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一段话，可能是我国关于史学史的最早论述，话虽不多，但把《春秋》的史料来源，记载的年代，文字的表述，写作的主导思想以及《春秋》的传播及其影响，都说到了，后来的史学家，也有一些关于史学史的论述，一般都比较零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比较多，但也不够系统。刘知几用大量的篇幅，停留在体例的论述上，趣味和见解比司马迁要差得多。

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数量还不大，但总是慢慢地多了起来。这些书，在见解和功力上，相互间的差距相当大。但也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或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象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认为神主宰世界，认为圣君贤相主宰天下，认为英雄人物决定局势的成败，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还有命定论、遗传论等等，都属于唯心史观的体系，但如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象这一类的论点，都

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史学史上也是不断出现的。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们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他的《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认识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著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历史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前途。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分析，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这样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要在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群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

·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人脑子里总有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部大书，书名索性就叫做《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教师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的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

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

(1983. 9)

一 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潮

民族危机的时代感

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我们离开这个时代不过三十多年，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史学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有很大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1919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已另有专文在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本文就不再重复了，打算谈谈另外的一些问题。现在先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民族危机的时代感谈起。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问题当时在敏感的史学家面前尖锐地提出来了。紧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人们对于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在今天不也还是有意义的吗？但这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如果说在这以前已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但决不会象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之深刻。当然，在近代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正确而深刻的答案的。

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作为史学家，首先表示了对民族危机的迫切的时代感。龚自珍主要是从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着眼的，魏源还特别重视了外侮的严重。

龚自珍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他把当时社会比作满身疥癬的病体，四肢被长绳缚在独木上不能动弹，而这长绳就是这种陈腐的皇家的“祖宗之法”。他用形象的话描写出封建“衰世”怵目惊心的情景，指出大乱不远了。他说，“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焦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①。他探索造成“衰世”的原因，大胆地谴责统治者对人们的摧残迫害，“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使其有力强武”^②。因此，他呼吁变革，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并警告统治者，“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致力改革，敦若自改革？”^④，他强调不变法就是坐等灭亡。龚自珍的这些言论，是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外国侵略的隐患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发出的时代呼声，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讲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⑤。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⑥。

因为在对时代的认识上，站得比较高，龚自珍批判当时盛行

①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② 《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

③ 《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

④ 《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⑤ 龚自珍号定庵。

⑥ 《饮冰室合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